

西方语言学丛书 12

Wester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语言变化原理 社会因素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William Labov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西方语言学丛书 12

Western Studies in Linguistics

语言变化原理 社会因素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Social Factors

William Labov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5-373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变化原理: 社会因素/(美)拉波夫著. —影印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西方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1-11653-1

I. 语… II. 拉…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349 号

©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Reprint from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II: Social Factors (First Edition) by William Labov.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It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书 名: 语言变化原理: 社会因素

著作责任者: [美] William Labov 著

责任编辑: 旷书文 徐 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653-1/H · 174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3334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9 印张 750 千字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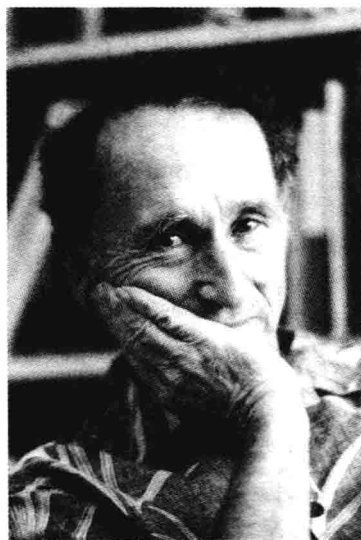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

威廉·拉波夫 (William Labov)



威廉·拉波夫教授,著名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主要创始人。1927年出生,196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语言学家 Uriel Weinreich 教授。1971年至今一直在宾州大学语言学系任教。*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期刊主编。获瑞典 Uppsala 大学、加拿大 York 大学、英国 Edinburgh 大学荣誉学位、美国语言学会萨丕尔教授称号,1996年本书第一卷获美国语言学会布龙菲尔德奖。

拉波夫教授是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大师,他不仅在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而且在语音学、实验语音学等学科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其主要论著有: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 (1966)、*Therapeutic Discourse* (1976)、*The Study of Non-Standard English* (1970)、*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1972)、*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1972)、*What Is a Linguistic Fact?* (1977)、*Locating Language in Time and Space* (主编) (1980)、*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1: Internal Factors* (1994)、*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II: Social Factors* (2001)、*Studies in Sociolinguistics* (2001)、*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2006) 等。

因其瞩目的成就,拉波夫教授 1979 年当选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NAAS)院士,1993 年

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1997 年入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of Science, AAAS),1979 年任美国语言学会(LSA)主席。

* 拉波夫教授照片由 Tom Morton 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在以往的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中,历史语言学家对“语言”的认识非常抽象。因此对语言变化的研究也基本上是脱离实际的。把语言变化的研究和具体的语言实际结合起来,使语言研究上升为一种经验性学科,这要归功于拉波夫和他的导师文莱奇(Uriel Weinreich)。这一学科在 20 世纪 60 年代蓬勃兴起,注重从语言实际出发,一般被称之为“社会语言学”。其实这一学科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社会”两个字上。这一学科是对传统的方法和理论的挑战,是语言研究中一个革命性的尝试,它试图把语言变化的研究变成一种可以直接观察、可以重复验证的科学研究。因此,也使得语言学的研究和其他学科的接轨变得可能。

此书是计划中总共三卷的《语言变化原理》的第二卷。第一卷/语言内部因素,已经于 1994 年出版。此书是第二卷/社会因素,着重研究各种社会因素,如:社会经济阶层、社团、民族、性别;语言变化的带领者;以及变化的传播、增长和继续。第三卷/认知因素尚未出版。

本卷主要寻找造成语言变化的实质底层。作者遵循著名语言学家梅耶的观点,语言变化的凌乱特点只能从其与语言社团的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本卷的主要材料是根据三十年来社会语言学对正在进行中的变化(change in progress)的研究,其中主要是作者本人的研究也包括其他学者的研究。主要研究材料来自美国费城,也包括美国纽约、底特律、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巴拿马的巴拿马市、埃及的开罗等等。作者通过自己对实际语言的直接观察分析,提出了众多的理论上的解释。作者对语言变化材料掌握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作者对语言现象的独特观察和理解也通常是前所未有的。书中介绍的在研究中使用的一些基本统计方法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实际而有用的研究工具。

* 沈钟伟,复旦大学文学学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语言学硕士和博士。美国麻州大学副教授。

作者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四条原理：

第一原理：自下的语言变化起源于中心社会群体，位于社会经济等级的内部。

第二原理：在稳定的社会语言变量上，女性显示更低的低俗变量和更高的高雅变量。

第三原理：语言社团以统一方式对一个规则分层的语言变量作出估价。

第四原理：自下的语言变化中，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创新的形式。

本卷共四部分，分成十六章，加上参考文献和索引，共 572 页。下文是对本书的基本结构和各个章节内容的一个介绍。

第一部分 语言社团

这四章分析语言变化带领者(leaders of linguistic change)的社会地位，从而为调查语言变化的原因建立基础。作者指出，如果“社会地位”这一个概念有意义的话，这就一定和某个社团的结构有关。第二章对费城做一个观察并通过其历史展示不同的民族迁入的过程，他们是如何进入工业经济，并在街区(neighborhood)中定居的。费城语言变化和变异的研究以此作为取样的主要基础。第三章显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语言变量额的剖面。从其年龄、性别、阶层和街区来测量在进行中的变化。第四章提供了一个其中含有正在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语音系统的历史描述。这个演进系统用一系列个人语言作出，从而得出了在显时(apparent time, 指从年龄差别分析中得到时间)和实时(real time)不同分布的第一个描述。

第一章 作者在本章中对与本卷主要内容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阐述。

1.1 作者指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某个方面受到语言变化的影响。从日常的词汇的使用中就可以辨别出说话者的年龄层次。作者指出了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即语言变化似乎总是在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年纪大的人会接受新的音乐舞蹈，新的电子设备和计算机。但是，从来没有人听到别人说，“现在年轻人说话的方式太好了。比当我

是小孩时的说话方式要好多了。”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黄金时代”原理。

1.2 学者早就指出了语言进化和生物进化的平行性。达尔文也曾经明确指出这两个进化过程的 15 个相似性,但是并没有加以解释。作者在这一章中为这 15 个相似性逐条提供了例子。达尔文认为最后两种平行现象,即变异和语言灭绝,显示了与生物进化中出现的同样现象:自然选择。但是语言学家的共识却认为语言变化造成信息丢失。因此,语言变化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作者因此作出总结,生物进化和语言进化尽管在形式上等同,他们的基本原因则完全有别。或者说,生物和语言进化尽管在形式上等同,前者的基本机制在后者中不存在。

1.3 对于音变的原因,作者回顾了前人的理论,包括省力原理、话语速度、传播非连续性、语言接触、功能强化、模仿原理、社团特征等。

1.4 前人对音变原因的看法涉及了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参数,但是很少区分不同类型的语音变化。而实际上,许多提出的原因只可以运用在很有限的类型上。因此作者接着区分并讨论了转移、弱化、合并、分裂、删除等多种音变形式。

1.5 作者说明,在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中,学者通常会指出语言要素和社会价值的关系。但实际上,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是相当独立的。本卷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对音位的具体音值的社会反应。

1.6 鉴定对音变起影响的社会族群。早期理论都预测创新是在社会的顶层或底层出现。但是这在社会语言学研究无法证实。作者本人的研究观察到创新的团体总是高层劳动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因此,关键的社会阶层对立不是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而是中层阶级和边缘阶级。由此,作者提出了弧线假设 (curvilinear hypothesis)。不同年龄百分比从年长到年轻出现单向增长,然而社会阶层出现弧线的分布。图 1.1 是对弧线格局的年龄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图示。

1.7 作者讨论了个人、群体和社团的关系,指出许多研究都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应当是个人而不是族体。但是,调查研究的不应是单个的个人,而是社会地位和社会类别。研究的直接对象是个人,但是目的是通过个人来研究语言社团。

第二章 本章通过对变化的带领者的社会地位来讨论语言变化的原

因,集中讨论费城语言变化和变异(LCV)。费城研究由三个部分组成,1973—1977 的初始研究,1977—1979 的在费城东部的范围更广的研究,及 1989—1991 对一些主要对象的重新调查。作者回顾了 1963 年纽约东部低地研究(LES)的研究方法,指出了 LES 的研究方法的四个局限:

- (1) 对年龄差别及家庭和族群的观察是机遇性的而不是计划中的基本设计;
- (2) 调查的方法是方言地理学中的问答方式。“随意谈话”的长度一般是 10—20 分钟;
- (3) 语音变化的测量是根据语音印象用单向的直线标度作出的;
- (4) 没有采用多向量分析的统计方式。

本章展示 LCV 研究在保留 LES 研究长处的同时,如何改进 LES 研究的不足之处的。本章也展示了使用不同方法所得到的研究结果。

2.1 一个精确的城市社团的语言情况不可能通过对几个人,或者几小群人,甚至更大的 30—40 人的社会网络来得到。正确的取样方法是应该通过随机取样,这样几百万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但是,不少研究都偏离了这个标准。有的只是选择那些愿意被调查的而达到性别、教育等的平均分布。有的研究则有时找的是朋友、亲戚和调查者的熟人。这样的调查方法可以提供很多信息,但是不能清楚揭示语言社团的结构及其变异的规则。作者还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的取样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并且进一步说明了 LCV 研究的取样策略。

2.2 不少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都有专门一章介绍城市的历史、地理、人口和文化。但是作者指出,尽管这些事实和数字虽然有用,却很难确定它们和语言的确切关系。这一节具体地介绍了费城的人口和地理、城市的边界及其历史发展。

2.3 在第一年的研究中,对近一百人的元音进行了测试。通过测试,确定了研究费城口语的形成需要以白人为中心,因为当地黑人的语言和纽约、底特律、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几乎相同。同时也确定了调查的社会阶层,并选定了五个街区作为长期的街区研究的地点。

2.4 本节是对 LCV 街区研究的介绍。作者详细讨论了研究中对各个街区区域选择的原因。最令人满意的调查点的三个特征是:

(1) 住房中住满居民,大部分成人是在此街区区域中长大的;(2) 居民间有高度的社会交际;(3) 邻近范围中有一定数量的购物和活动场所。据此,研究选择了五个街区区域(详见原著 51 页)。

作者进一步详细介绍了街段(block)的人口构成、街段的各方面的情况以及社会阶层和状态的测量中的各个细节。在 LCV 研究中用了三个六级尺度来建立社会经济指数(详见原著 61 页)。

作者还讨论了几个和社会经济有关的指数:房屋维修、社会地位变化和民族区别。

2.5 本章介绍了费城 LCV 的电话调查的方法及其优缺点。电话调查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可以以随机取样来调查。

第三章 本章重点是讨论和语言变化不同的稳定的语言变异。费城的社会语言变异说明稳定的社会变量和年龄无关,而是和社会阶层有关的。

3.1 语言变体的出现有两种基本可能:由动态的语言变化造成的,或者由稳定的社会语言变异造成的。本章讨论的重点从语言变化转到稳定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研究显示:

- (1) 语言变化具有零星散发特征,开始和终止的时间不能用任何普遍原理(universal principle)来预测;
- (2) 延续几个世纪的长期的以稳定形式出现的变异可能比会完成的变化更为常见;
- (3) 变化的方向逆转,或者平行街区中出现的方向相反的回转变化并不少见。

这三种特征都在费城的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中出现。这样的变化是本章的主要重点。本节进一步探索了在第一卷第三章中讨论过的显时和实时的关系。

3.2 LCV 研究中选择了四个社会语言学的变量(“()”中的内容代表某个社会语言学变量): (dh) = 齿间浊擦音[ð]的音位变体, (Neg) = 否定协和, (ing) = 在非重音音节中的/n/和/ŋ/的交替, (ACor) = 词表中紧的短元音/a/的纠正。LES 研究中的(ing)变量在说话方式和社会阶层中有规则表现。这种有规则的表现不是方言混合的杂乱结果,而是由说话人的语言行为决定的有高度制约的形式,

是稳定的语言变异的表现。在 LES 研究之后三十年,在不同的语言社团,甚至在世界不同的地区的研究中得到反复证明。本节进一步讨论了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稳定变异的形式、稳定变异的结构位置、多变量分析的意义等。

3.3 本书是研究语言变化,但是从社会语言学家的观点来说,更令人注目的现象却是和变化对立的稳定性。可以说缺乏变化的现象对认识语言结构具有最重要的作用。长期存在的稳定语言变异具有稳定性,并不是两个历史阶段中间的一种转换现象。如果语言变异可以在二十代到三十代说话者之间传递而不变并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就必须在人类语言生态学中寻找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来表达这种变异关系。这一节中专门讨论了(ing)的历史、(th)和(dh)的历史以及否定协和等几个变量。

3.4 本节讨论了费城的三个稳定的社会语言变异。这个社会取样共有 183 个人。表 3.2 包括了以费城不同街区为统计单位的具体统计数字。

3.5 本节对费城、纽约以及底特律的社会语言格局进行了比较。作者将社会经济标度分成五级(详见原著 95 页)。随意的和谨慎的两种说话风格出现单向的分布。很明显费城的这种分布和纽约是一致的。对词首(dh)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1)社会经济阶层(SEC)的效应最强,SEC 指数越低,(dh)指数越高;(2)其次年龄效应也很强,年轻的(dh)指数更高;(3)第三种效应是性别,女性的(dh)指数比男性低;(4)社会移动性是第四种效应,但是并不非常显著。表 3.3 列举了对词首(dh)回归分析的数据。表 3.4 和 3.5 分别列举了对(neg)和(ing)回归分析的数据。社会语言的格局在以上三个分析中相当一致。表 3.6 则显示(dhv)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变量,只受社会经济阶层影响。

3.6 本节是对不同年龄组随意和谨慎语言风格的分析。作者按照现代美国社会的情况将年龄分成六组(详见原著 101 页)。图 3.7 中的三个图显示了相当类似的,既非扁平,又非直线的格局。最高值出现在 17—19 年龄组,在 40—49 年龄组中降到最低,在 60 以上的年龄组中又显著升高。图 3.8 表示了谨慎风格的格局。本节接着讨论了随意和谨慎风格的社会意义。

3.7 本节是对不同年龄组跟社会经济阶层的交叉分析。分析中用了四个社会经济阶层:低层劳动阶级、高层劳动阶级、低层中产阶

级、高层中产阶级（只有 13—16 和 40—59 两个年龄组）。图 3.10 显示出年龄和阶层间在谨慎风格上相当程度的互相影响。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在显时（年龄）中出现不同的格局。

3.8 本节对使用年龄和阶层组合的类别作分析。图 3.13、3.14、3.15、3.16 分别表示了对(dh)、(neg)、(ing)和(dhv)四个变量的分析结果。作者对各个分析结果作了讨论。作者指出，社会地位越高，非正式形式的使用频率越低。

3.9 这一节仔细探讨并作表分析了各种阶层标识和语言变量的关系。作者认为有必要区别两种不同的教育指数(Ed1 和 Ed2)。不然的话，受过高等教育家庭中的三年级孩子的教育程度指数会和一个 80 多岁没有读完小学的低层劳动阶级的人相等。

3.10 对稳定的社会语言变量进行分析，这为测量正在进行中的变化提供了基础。指出稳定的社会语言变量和成年人的年龄无关，而是和社会阶层有关的一种单向函数。

第四章 本章将费城方言放入整个美国英语的范围讨论，从而更仔细地更精确地报告一个变化中的元音系统。

4.1 本章对费城的方言历史背景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作者研究过的所有欧美方言中，语音变化最为活跃。在语音中主要的变化是元音和流音。费城也不例外，出现了北部城市或南部城市的元音转移。更有意思的是，费城出现具有费城特征的元音转移的格局。这样的元音变化不是单独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这些变化都在第一卷中有过详细讨论。

4.2 美国英语方言可以归纳为几个跨越广大地区的种类。像费城这样的一个地区系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中得到更好的理解。费城的元音系统是一个不变和变化中的成分的组合。系统的研究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现在的音变必须用更早的相对稳定的阶段表达，二是这种表达对费城和周围方言是相同的。表 4.1 列出了费城元音的初始状态。

4.3 本节列出了费城方言有关的各种历史纪录。从这些记录来观察，费城方言是按照南部元音转移的轨道发展。作者逐个讨论了短元音、带前滑音的复元音、带后滑音的复元音以及带央滑音的复元音在费城方言的状况。

4.4 本节根据社团中一些有特色人物的录音材料来讨论费城元

音系统。这些材料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费城 LCV 街区研究中取出的。Joe Donegan, 84: 最早层次; Helen Ryan, 65: 早期女性言语; Kate Corcoran, 45: 当代费城系统; Barbara Corcoran, 16: 新派费城系统(女性), Rick Corcoran, 13: 新派费城系统(男性)。这些人的元音提供了三代人语音变化的动态证据。主要元音从元音空间的一个极端变到了另一个极端。

4.5 图 4.8 中所显示的 10 个费城音变的变化方向是根据费城街区研究中的 10 个年龄组的平均值作出的。这些平均值都作了标准化处理。五个前元音出现高化。第二共振峰是个敏感的社会变量。图 4.9 显示第二共振峰和年龄有关, 年龄越小, 第二共振峰就越高。图 4.10、4.11 分别显示了四个后元音第二共振峰和一个前元音第一共振峰在显时中的变化。

第二部分 社会阶层、性别、街区和民族

第五章 本章运用第三章的方法将第四章的语言变量和第二章以及第三章中所描写的独立变量联系起来。

5.1 本章分析所依据的材料是 112 个个人元音系统的测量数据。数据库包括每个人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住房价值、SEC 指数、住房保养、社会活动性、街区、交际指数(详见第十章)、民族等信息。元音测量是 16 个音位的音位变体。表 5.1 列出了这 16 个变量。每一个变量有 12 个统计数据, 分别是 F1、F2、F3 和 F0 的平均值、数目和标准差。

5.2 总的来说, 跟印象性记录相比, 仪器测量的优越性是精确可靠, 最重要的是客观。作者逐个介绍并讨论测量共振峰, 选择元音样品, 确认主要元音, 电话信号的仪器测量、标准化等技术性问题。

5.3 表 5.3 的数据是以年龄作为变量对 10 个元音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一个简单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可以分为三组来说明。(uwF)、(uwC) 的变化不明确、(owC)、(owF)、(æhS)、(æhN) 呈现出和年龄有关的变化, (æhD)、(aw)、(eyC)、(ay0) 和年龄有很强的相关系数。

5.4 图 5.5 比较了五个社会阶层在五个元音第二共振峰上的差别。社会阶层和前元音在第二共振峰上的支配性相当明显。具体的讨论可以参照第一卷的有关章节(505—515 页, 以第五章至第九章, 第十二章和第十四章)。

5.5 本节讨论对年龄和社会阶层的回归分析。表 5.4 是多变量(年龄、性别、社会经济阶层)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表 5.4 清楚呈现了新的活跃的音变((aw)、(eyC))的弧线格局。在这两个音变中高层劳动阶级是最领先的。

5.6 本节讨论分析了六个元音和不同年龄组的具体关系。除了一个元音之外,13—16 年龄组总是出现更高的数值。

5.7 本节讨论费城三个新的活跃的音变中(ay0)的央元音化在不同年龄组中的表现。

5.8 本节总结了材料中可能出现错误的 8 种情况。由于这些错误的存在因而无法确知这些错误在一起是否掩盖了我们所寻找的现象,或者形成假象。但是,由于从两个不同的调查方法得到类似的分析结果,说明了材料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作者从性别、社会经济阶层、电话名单的偏向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5.9 这一节对职业、教育程度、住房价值三个因素的内在关系作了分析。表 5.9 中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说明职业和住房价值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图 5.11 显示了职业和教育程度及住房价值的具体关系。图 5.12—15 是对四个不同元音和社会经济指标的分析。图 5.16 是对个人社会指标的综合性分析。

5.10 新的活跃的变化并不受到职业、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的约束或促进。对进行中变化的分析显示不同阶段的发展和一系列的社会属性有关。本节对不同阶段的变化,初期的变化、末期的变化、中期的变化以及新的活跃的变化作了概述性的讨论。并重新将弧线假设叙述为第一原理:

第一原理:自下的语言变化起源于中心社会群体,位于社会经济等级的内部。

5.11 本节对两个重要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作了进一步观察。Guy 等 1986 对悉尼澳洲英语中高升句调在年龄和社会阶层中的表现作了研究分析。表 5.10 是不同年龄组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变化百分比。Haeri 1996 对开罗阿拉伯语的研究中,确定了一个新的活跃的音变,/t/和/d/在前元音前腭化。图 5.17 显示强和弱两种腭化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关系。

5.12 追究变化原因的基本策略是识别进行中变化的带领者。

不同地区的音变中的带领者都趋向于社会经济阶层的中间部分。没有证据能够支持十九世纪语言学家的看法，即变化是从社会的最高层或最低层出现的。在本节中作者对这个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5.13 作者在本节中针对弧线格局的意义，探讨了语言变化是否可以用环境适应的任何过程来解释。并对各种变化原因的解释作进一步的论辩。

第六章 本书对进行中的变化的研究完全是以语音发生的客观证据为焦点。这章讨论感知中的变化，或者说是音变的主观反映。

6.1 第五章中的有关语音发生的研究的材料也包括了说话者的感知反映和主观评价。最简单的方法是观察被试者对语音最小对立和变化测试的“相同”或“不同”的感知。本节的内容是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讨论。

6.2 本节具体介绍了费城自我报告的测试方法。自我测试中选了费城音系中五个变量。其中包括费城音系中四个在变化中的元音：末期的(æh)、中期的(ow)、新的活跃的(aw)和(ay0)。录音中包括作者自己发音的每个变量的四个变体，代表社团中听到的变体范围。表6.1是91个被调查者对这五个元音做出的反映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表6.2是对年龄、性别、社会经济阶层和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但是分析并不显示明确的结果。作者对这些结果作了一些猜测，并作了进一步分析。

6.3 本节是另一种研究方法的介绍和分析。这个研究中设计了几段含有所要调查的变量的短文。这段短文由四个费城人CF, RD, MK, CS发音。这四个人有不同的职业背景，代表了一定的语言变化范围。录音中包括24个句子，列在表6.4中。表中每一个变量都标上了代表四个变体(见6.2)的数字。判断用一个表示“合适性”和“友好性”的7度标示法作出，以7度为最高，1度为最低。7度标为“电视人物”，1度标为“没有工作”。由99个费城人对录音作了判断。图6.4是对四个发音人(æh)和(ay0)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显示。图6.5是对这四个发音人评分的平均值。图6.6是四个变量的图解分析，显示语言变量和职业合适性的关系。作者还仔细讨论了“合适性”和“友好性”的关系，以及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费城的主观反映的测试调查说明以下社会语言学的基本信条：个人的语言行为只能在所属的社团中被理解。语言和社会语言学结

构一致性和同一性发现得越多,对语言变化的认识反而变得更困难。一般来说,一致认为语言不应该变,所有发生的变化都不好。但是,事实是变化继续显示在规范结构中所存在的弱点。应该有隐蔽原因促成变化,但是这样的原因仍然证据不强。

在分析研究了性别、年龄和社会阶层对语言变化的反映之后。在本节中作者提出了称之为“统一评价原理”的第三原理。

第三原理:语言社团以统一方式对一个规则分层的语言变量作出估价。

第七章 街区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定点研究中的一类。这种定点研究和社团的随机取样相对立。后者是调查方法的基本方法,前者则是城市人种研究更常用的方法。作者详细地讨论了社会语言学中这两种方法的利弊。本章着重探索特定街区中的居住是否会影响某个人的音变状况的问题。

7.1 多数的街区在一个城市中的特征是阶层结构而不是其地理位置。一般也都相信在大城市里有不同的城区方言存在。所有的证据却说明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大城市之中的各个区域相当一致,但是社会阶层、民族、性别和人种出现高度差异。

7.2 Milroy 在 Belfast 的研究(1980)是地方街区研究中最最为详细的。这三个街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似,都是低层劳动阶级。表7.1是 Belfast 九个变量分析的回归相关系数。结果主要显示出男性优势,而年龄和街区作用不明显。结果也说明了在 Belfast 不出现明显的地理差异。

7.3 和 Belfast 的研究不同,费城的四个街区的选择是根据是其社会经济上的差异性,而不是其相似性。表7.2中的数字是这些街区社会经济的分布。

7.4 表7.3是几个接近完成变化的分析结果,第三回归分析和增加了社区变量的第四回归分析的比较。结果显示(αhN)和(αhS)都有很强的街区效应。但是这不是真的地区效应,这只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社会层次的一般特征而已。表7.4是对两个新的和活跃的变化(aw)和(eyC)的第二共振峰的分析结果。表7.6是对三个中间阶段的变化(owC),(owF)和(uwC)的分析结果。表7.8是对($ay0$)央元音化的分析结果。

7.5 本章在开始时就提出了没有街区效应的可能性：费城会显示出地理上的一致性。但是并非如此，Kensington 的 Wicket 街的变化领先现象在所有的变化中都很明确。作者对此现象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7.6 不同的社会中民族间的差别也会不同。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团体通过宗教凝聚，不是一种个人选择，而是取决于家族来源。在美国犹太人更是和家族来源，而不是和宗教有关。和语言变化有关的对于民族群体的研究关心的是放弃了自己原有的语言而使用英语，但是仍然以上一代或上两代人的母语作为和其他说英语的人的区别。民族应该和语言最有关联，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不同民族的英语相差无几。这个现象建议说话者尽量避免他们上代的外国口音。表 7.10 显示了在外国出生和在纽约本地出生的被调查者的语音变量。犹太人中的高层中产阶层男性青年和劳动阶层中老年女性的比较显示，在第二代和第三代人中并不存在明显差别。图 7.4 是 Laferriere (1979) 对波士顿英语研究的结果。显示了 3 个民族，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在随意、阅读和正式三种语体中的低后元音 [ɒ] 出现的频率。似乎犹太人对这个元音更敏感。本节还介绍讨论了 Knack 对 Grand Rapids 犹太人社团的研究 (1991)。

7.7 费城是个有 r 的方言。除了一些异化的词，如 quarter, ordinary, forward, 和 corner 之外，费城的白人一致发元音后的 r。但是人们经常可以在费城南部的意大利人地区里听到元音化的 r。表 7.12 是 60 个费城南部人的 (r) 的出现与否的数字。意大利和非意大利人的区别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非常强。作者讨论分析了 (r) 的元音化是否是意大利语的特征的问题。总的来说，r 的元音化集中在费城南部的意大利后裔中。作者又对 34 个出现 (r) 元音化的人以民族和性别做了进一步分析 (表 7.17)。最后作者对有无重音的 (r) 的内部差异进行了分析 (表 7.18)。结果显示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区别明显。

7.8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本节进一步讨论了 /o~oh/ 合并的斯拉夫语效应，let 和 make 的混淆，波多黎各人 later 的用法，为何在后元音前化中意大利人滞后等变化。

7.9 与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及街区等因素不同，大多数在进行中的音变中不出现民族效应。如果出现的话，也只是和某一个特别的元音有关。出现民族效应的唯一例外是费城街区研究中的 (uw) 和 (ow) 的前化。表 7.19 显示，意大利人在所有四个变量上都表现出负